

趙國壯，《東亞糖業史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年，270頁。

20世紀以來，近代東亞糖業史的研究可分為生產技術、貿易流通、區域社會與消費文化四大角度。隨着區域史的流行，審視某區域中的產業，成果頗多。陳博翼在〈從月港到安海——泛海寇秩序與西荷衝突背景下的港口轉移〉一文中曾指出，區域史研究並非簡單的個案拼接，而是在個案中進行概括以揭示結構性的特點與全局性的共性。村上衛在《近代中國研究入門》中則提到，討論某區域在某時段的特有產品時，應考慮其內外貿易流通所受到的全球化影響。因此，如何在全球市場的框架下，進一步統合「特點」與「共性」，進而發掘糖業格局的變動邏輯，便成為值得深思的問題。

學界此前頗注重從貿易市場比較各區域糖業，但其落腳點仍回到對單一區域的討論上。這種做法還是沒有將各區域置於宏大的視野中進行共時性的比較。2021年，《東亞糖業史研究》一書則對此做出了回應。作者趙國壯長期從事糖業史研究，致力於蒐集相關方面的史料。該書由其多篇論文組成。朱英在序言中將全書結構分為4個部分。引言和第一章總領全書，指明糖業史研究的學術脈絡、新史料與拓展方向。接下來的章合為第二部分，集中考察了中國糖業。第三部分為最後章，討論了舊格局解體後，東亞糖業多元競勝的面貌。

第二部分從消費史的角度出發，討論甜味認知、糖品功能、糖品受眾，揭示了中國糖品「庶民化」與「商品化」的進程。作者將此視為明清糖業「變革」的結果。「變革」呈現為甘蔗種植方式程式化、製糖技術革新、福建蔗種的傳播以及東亞蔗糖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推動「變革」出現的原因是東亞蔗糖生產力爆發引起的產量激增與糖價下降，因此才有可能出現糖的「庶民化」。然而在到達巔峰後，中國糖業就面臨着近代洋糖衝擊的困境。因此，第三部分將視野擴大至東亞，考察各糖業經濟體在這一階段的變化。

第三部分探討的是精糖主義如何推動東亞糖業格局的演變，而各國糖業又用什麼方法來降低風險。一方面，大眾漸趨追求精糖，使善製精糖的香港、日本慢慢能和粗糖為主的爪哇各擅勝場。另一方面，精糖產業亦需要粗糖作為原料，這一定程度上也維護了粗糖大國的產業。日本主要依靠政府力量來維護糖業穩定。無論是在東北亞發展甜菜糖，還是臺灣的糖業統製，都是在試圖實現原料多元化與粗糖的自給自足。爪哇與日本各自建立了原料、

粗糖與精糖的完整產業鏈，大大降低了糖業風險。相比之下，香港更注重以擴張市場並調整價格來降低風險。另外，近年來瞿亮發表的〈砂糖產業與近代日本的南方擴張〉一文強調了日本因東北亞甜菜計劃的失敗，轉而更積極地發展南方蔗糖業。這一論斷可為第八章起到補充的作用。

本書在史料層面的突破主要表現於對英屬香港怡和、太古公司檔案資料的利用。該檔案的優勢是逐年記載的系統性，可以還原一段不間斷的變遷史。且以往多數糖業史研究使用的海關資料雖有逐年記載，但提供的是外部視角，而糖企檔案不僅編年記錄，還補充了內部視角，體現了企業自身對商業局勢的分析和判斷。正是憑藉這部分史料，本書細緻地勾勒出香港糖業的面貌，展現了怡和與太古在製糖業上不同的命運。至於古代中國糖業的新史料，作者指出應注意各地出土的實物資料以及未刊的文獻、碑刻。石刻一般記錄了糖商在某地的社會活動，因此這類史料的蒐集常需圍繞廟宇、會館等場所進行。

本書所描述的東亞糖業在市場中自救與競爭的方法大概可以分成兩種模式。一種是爪哇和日本的縱向拓展，即通過組建完整的產業鏈，使其可以進軍精糖、粗糖的分層市場。而香港的橫向拓展注重開發新的區域市場，當然也包括細化舊市場的管理。如在中國各區域設置不同的價格。這兩種模式都表明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發展成為東亞糖業競爭的主流形式。此外，中國糖業危機的出現也是因為規模與發育程度不同的國內外市場相互碰撞，而土糖業原來的生產模式一時無法適應所致。作者正是把握到了這一變化，所以強調是市場分層推動了東亞糖業格局的形成。

本書另一重要觀點是重新審視中國近代糖業史的「衰退論」，指的是中國本土糖業在20世紀前後出現了明顯的衰退。在考察近代中國各區域土糖遭受洋糖衝擊時，研究者亦多採納衰退的舊說。如范毅軍的〈廣東韓梅流域的糖業經濟（1861—1931）〉、胡剛的〈二十世紀初閩南蔗糖業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以及張兆金的〈清末民國時期洋糖衝擊與贛南糖業應對措施分析〉等等。然而趙國壯指出中國近代糖業並不適合以「衰退」來形容，而應以「危機」一詞來定義糖業發展實態。「衰退」一詞遮蔽了糖業近代化中存在的「機遇」，而且「衰退」並非僅憑銷量變化與技術不振足以表述的。作者以近代各地區手工業發展的多元性印證「衰退論」解釋範圍的有限，亦頗有見地。然而本書的第四章小結部分中作者指出若某區域的糖業抓住機遇就「必能成功」，則未免有些武斷。機遇的存在和糖業出現突破、走向成功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繫，還需再做考量。我們知道在一段連續的歷史中，機遇或

大或小，都在不斷地產生與消失，而決定糖業改革中得以抓住機遇的因素亦複雜多變。所以，糖業存在機遇不意味着最終能使產業轉型，而能否抓住機遇又何嘗不是一件充滿偶然性的事。

通過矯正概念重釋糖業各個面相，無疑是學術進步的一種表現。但筆者認為，中國近代糖業「衰退論」的原貌並不是對糖業的全部否定。當我們回溯「衰退論」的源頭時，不難發現其源自清末民初，是時人對糖品出口量大減的一種直觀感受。就這種感受而言，衰退的形容並沒有太大問題。此外，這個衰退期一般指的僅限於19世紀末至1930年間。1931年後，國民政府通過提高關稅來限制洋糖，並修建糖業工廠、鼓勵植蔗，使廣東、福建、四川等產糖區漸有起色。之後數年，中國透出了糖業復興的曙光，然而日軍的侵略遲滯了東南沿海糖業轉型的進程。也就是說，不可預見的政治因素參與到了糖業的發展之中。與此相反的是川糖產區因國民政府西遷，大大加速了製糖機器化的進程。同樣是不可預測的政治因素，在不同的區域產生了不同的效果。若只是籠統地用機遇的把握來概括，或許也遮蔽了現實情況的複雜性。區域糖業發展脈絡，應當是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包含的邏輯亦未必理性。

同樣以本書提到的汕頭糖業為例。晚清汕頭開埠後，潮糖出口擴張，但其間亦存在波動。然而在20世紀初，潮糖不再有19世紀下半葉那樣的出口盛況。就海關報告中蔗糖出口量的下滑而言，人們覺得較之此前一落千丈了。但如果從技術的角度看，則潮汕糖業不僅相比汕頭開埠的時候沒有退步，反因引進西方製糖機器而大有長進。因此，在不同的角度判斷產業是進是退，所論難免失焦。而用「危機」來重新概括近代中國糖業的遭遇，相對準確但亦屬籠統的總結。當然，「衰退論」最大的問題，可能是使學者長期以來傾向於找產業失敗的原因，而在考察其積極面上力度不足。但此論本身不僅是學術史上重要一筆，更能反映當時的社會認知，學者可藉此觀照政府與糖商的決策背景。

閱讀此書時，還可感受到作者對於糖業地理的省思。但在作者復原糖業地理時，卻未遑更深入地探討空間格局的成因。如「福建為明清蔗種原發地」一節，面對學界多持「福建源流說」，或許我們還應追問，為何是福建人實現了中心開花式的蔗種傳播？福建地域與人群特質，是否與這種傳播方式有關？而福建蔗種被帶到新地點，又是如何為當地人所接受？這些問題的討論，提醒我們在呈現糖業地理之餘，亦需注意考其原因。

總之，《東亞糖業史研究》一書在充分運用新材料的基礎上，注重從市場的角度考察東亞各區域糖業產銷結構的變動，並使之相互發明，以映襯出糖業變遷的邏輯。雖然書中部分文章發表至今已有10年，但作者對新史料的挖掘與利用，對東亞糖業的宏觀檢視，都在糖業學術史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紀植元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朱玫，《編戶齊民：朝鮮近世的戶籍文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269頁。

戰國秦漢以降，中國為強化基層統治，逐步構建出發達的戶籍制度，並衍生出各類戶籍文書。通過戶籍制度實現「編戶齊民」，達到政權統治基礎的穩定，此舉不惟中國歷代王朝沿襲，更深刻影響久被中華文明浸潤的朝鮮、日本、越南等東亞國家。各國基於自身國情，構建相應的戶籍制度，編造各具特色的戶籍文書。而戶籍文書對於研究賦役制度、社會構造、家庭人口、地方社會與國家關係等問題具有重要價值。此中以朝鮮半島最具典型，朝鮮的戶籍文書可追溯至漢四郡的木簡《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別戶口簿》，其後歷經三國、高麗，直至朝鮮王朝，最終形成體系完備、程序複雜的戶籍制度和規模龐大的戶籍文書。中山大學朱玫《編戶齊民：朝鮮近世的戶籍文書》即是針對朝鮮戶籍的研究著作，該書作為「新經濟史叢書」之一，以朝鮮戶籍為研究對象，考察「編戶齊民」在朝鮮半島的接受以及落地過程，揭示戶籍制度在朝鮮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中的歷史地位，為研究東亞史、中外交流史開闢了新的研究角度。

首先，全書分為緒論、主體、結語3個版塊。在緒論中，作者指出本書從長時段和比較史的視域考察朝鮮半島的戶籍文書與戶籍制度，揭示朝鮮社會基於自身歷史脈絡所形成的編戶齊民機制及其在朝鮮社會的內在化與更新改造過程，在此基礎上思考「戶籍與東亞官僚制國家形成，乃至東亞近代化過程的關係」（頁10）。

其次，該書主體可劃分為3個層面，其中第一至四章圍繞戶籍文書本身，系統考察高麗、朝鮮時期戶籍文書的保存形態、內容格式、攢造制度以